

解构孙绍振



孙绍振

吴励生 叶勤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解构孙绍振

吴励生
叶
勤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构孙绍振/吴励生, 叶勤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211-05798-6

I. 解... II. ①吴…②叶… III. 孙绍振—文艺理论—研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2255 号

解构孙绍振

JIEGOU SUNSHAOZHEN

作 者: 吴励生 叶 勤

责任编辑: 施国忠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31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5798-6

定 价: 3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开宗明义，此书名为《解构孙绍振》，并非赶西方解构主义的时髦，甚至也不是在德里达等人的意义上来使用“解构”一词，而是回到这两个汉字原初的含义——解开某种结构，以便我们能够真正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它。也即：这个结构，自然是孙绍振的理论结构，无论是其表层的蔚为大观的文论体系，还是深层的坚实的精神内核，都在我们的“解构”范围内。而这一“解构”的目的，则是厘清孙绍振先生对于当代汉语文论的贡献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以及究竟有多重要和多深远。

实话说，写《解构孙绍振》刚开始多少有点出于理论直觉与本能，实在不敢说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野心”，对于陈平原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倡的“学术史研究”，我们虽然“别有会心”，却只能说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借用陈平原先生的说法：“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20世纪中国学术’。”（“学术史丛书”《总序》）当然，“获得方向感”以及“自我定位”的愿望也确实

是有的，“自身的困惑”更不待言，而“研究策略”一时还真谈不上。

我们写作《解构孙绍振》的动机直接来自当下学界的一些具体运动的启发和刺激。众所周知，自“人文精神大讨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争论”以来，真正深入人心影响深远的学术运动当推“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进入21世纪的当下，该运动已经进入了第二轮，并产生了两大派别：以杨玉圣先生为代表的“实践务实派”和以邓正来先生为代表的“超前学理派”。目前，此两大派别均已进入“提升学术研究品位、让学术回归学术本身、大力推介学术研究精品”并全力构建高端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交流平台”（杨玉圣语）的最新境界，邓正来先生贡献出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并以此作为标志，把中国的“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研究全方位地往纵深推进。凡此种种，无不昭示了一个极其醒目的学术目标和重要时刻：知识引进运动——包括学术消费、学术搬运、学术狂欢在内实在应该结束了！其不仅遮蔽了我们自身的问题，而且更可怕的是无视本土的创造——我们亟须重建我们的学术传统以及能够“促使知识增长和学术发展”（邓正来语）的学术制度。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主体性中国”的思想了，既不能毫无思想地进行学术消费和学术狂欢，也不能简单地对外来学术说“不”，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中国。实际上，我们关于孙绍振的研究便是在此宏阔而又深邃的背景上提出来的。

我们当然必须了解西方的批评理论模式，但我们有什么理由忽视更为切身得多而且毫不逊色的自身理论创造？我们的批评理论模式或者范式实在应该对西方的批评理论模式做出回应甚至构成批判，尤其是在当下全球化结构之中，必须把我们的自身问题进行理论化处理，而绝不可以继续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下去。我们

以为，当务之急便是对我们已有理论范式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做出追究，而《解构孙绍振》一书便是我们对这场“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做出的一次具体呼应和努力。

同时我们也清楚，目前，我们的研究和批判大多仅局限于逻辑层面（尽管这个层面极其重要，我们学术研究的具体范式与真正的学术共同体产生可能均端赖于此），我们还来不及从历史的层面做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也即陈平原先生所说的那种“研究策略”，只能暂时付诸阙如。我们知道，从本土的意义上说，无论是学派抑或文派，很多的时候都来自同人以及后人或学术话语或文学话语的建构——远的不说，近的就有关《新青年》同人与“中国新文学大系”同人等。我们可以假设一下，从孙绍振在新世纪前后发起的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起，直至参与中学语文教学的论战，最后接受教育部邀请主编中学语文课本，这些集中体现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做这样的联想：百年前章太炎先生对“教科书”的教学法就极不以为然，并说：“现在为教育起见，原是要编一种简约的书，这个本来不是历史，只是历史教科书。所以说教育的事，不能比讲学的事；教科的书，不能比著作的书。”以及梁启超的说法：“我主张高小以下讲白话文，中学以上讲文言文，有时参讲白话文。做的时候文言白话随意。以为‘辞达而已’，文之好坏，和白话文言无关。现在南北二大学，为文言白话生意见；我以为文章但看内容，只要能达，不拘文言白话，万不可有主奴之见。”后来，文言教育仍然保留，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文教育占上风，五四新文学的作品通过教育体制全面进入了中学教育，从而使五四作家的成果获得了现代经典的地位。意味深长的是，孙绍振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对中学语文教育的体制化发起了猛烈冲击，并声称中学语文教育“理论落后二十年，思想方法落后五十年”，那么，其中究竟存在

哪些特别重要的亮点和盲点须引起人们做更加纵深的思考？比如，体制化本身就是一柄让人欲说还休的双刃剑，又比如章太炎当年的教育主张以及“学在民间”的学术追求，经过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而重放光芒，至今启示意义重大，等等。也就是说，假如说“重新认识中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特殊使命，那么，历史的维度确实殊关重要——也即陈平原先生所说的“与我们血肉相连的‘20世纪中国学术’”进入我们的视野殊关重要。

重要的当然还不仅仅是逻辑的与历史的两个维度。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讲，需要追究的起码就有诸多学者解读的哈贝马斯提出的三个知识类型：经验—分析的知识类型、历史—阐释的知识类型和批判的知识类型。从我们对孙绍振文论研究的切身体会来看，我们认定孙氏文论属于我们本土特具原创性的经验—分析的知识类型。我们也曾经试图寻找国内不同知识类型的学者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可惜未能如愿，不是找不到，而是基本缺乏可比性。比如，持批判的知识类型者如邓正来，他研究的是哲学以及知识社会学，尽管他常常是进行跨学科研究，但基本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又比如，持历史—阐释的知识类型者如陈平原、周宁，尽管两位均是人文学者，而且均研究文学学科，但两位也均作跨学科研究，陈平原的研究横跨文学史、学术史、大学史，堪称杰出学者，对人文传统的研究成绩也让人惊叹，打通原本壁垒森严的文学评论、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三个领域按说势在必行，可对于不同的知识类型，即便是传统意义上的“通人”恐也难以胜任，况且他已经有意无意“嫁接”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而周宁的文化研究色彩更加浓郁，绝非那些喋喋不休于英国伯明翰学派、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结构主义之类的“文化研究”者可比，他有着相当高度的前沿理论观照和相当深入的独特思考……而对文学本体却似乎关注不多。也许比较不成反倒让我们看到了

足够的理论张力，至少不同的知识类型的出色表现，预示了不同的研究范式的反复出现，而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就可能出现在这不同的研究范式乃至不同的知识类型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书院教育”所产生的学派或文派（假如不说拉帮结派而单指“门派”或“门户”的话），是否应该得到重新认识与反思？加上现代大学教育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和变革，“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才能真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再假以时日，学术共同体意义上的真正学派就可能诞生在这勃勃生机之中，若此，我们能为之添砖加瓦，幸甚矣！而在《解构孙绍振》的第五章《惊心动魄的阅读与文学知识演进》和第六章《错位范式探究与学术共同体的可能性》中，就分别讨论了学术传统与研究范式的关系、学术研究范式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学术共同体与学派的关系等等，其种种讨论，实际上均指向了“孙氏学派”的可能出现或已然出现，若此，我们能为之修桥铺路，慰甚矣！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先后获益于杨玉圣教授、邓正来教授、赵虹主编、高建军先生、杨健民总编、管宁总编、黄文山主编、林建法主编，尤其让我们感动的是，《社会科学论坛》的社长兼主编赵虹先生不仅腾出了近10万字的版面发表了我们的关于孙绍振研究的一系列论文，而且为我们的《孙绍振访谈录》做了具体策划和组稿工作——对他做出的颇具超前学术眼光的大力支持，我们不能不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需要感谢的还有《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的支持，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为本书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

目 录

自 序	(1)
绪 论 测不准的孙绍振	(1)
第一章 从文本细读到理论范式	(9)
第二章 《美的结构》与《论变异》的二元转化错位	(53)
第三章 错位范畴的拓展：幽默理论与实践	(84)
第四章 回到文学本身：多重解构与多重冲击 ...	(115)
第五章 惊心动魄的阅读与文学知识演进	(144)
第六章 错位范式探究与学术共同体的可能性 ...	(199)
[附录一] 经验解剖与文本人文的双向回旋	(225)
[附录二] 思想的舞蹈：怀疑与归纳	(242)
[附录三] 孙绍振访谈录（二篇）	(248)
[附录四] 孙绍振主要著作及论文简目	(289)

绪论 测不准的孙绍振

全面解读孙绍振的著作，首先给人冲击的是：我们能够真切地感知，我们本土一个特别优秀的学者和作家，整整 20 年，如何把他个人的问题意识与他的个体经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又是如何跟他的文本阅读实践立体地结合在一起，并取得了既无愧于本土先贤也决不逊色于当下一些西方权威的文化理论所达到的成就，或者说在他们各自展开的理论范畴以及各自做出的个体论证上，各有千秋，均有着不可重复的精神指归以及各自本土意义上的有效性。其次是，解读孙绍振的著作让我们不无激动而又心情复杂地阅读着一个曾经充满光荣与梦想的时代，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个重新竖起启蒙理性思想大旗的激情澎湃的时代。我们知道，无论是那个遥远的“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五四时代启蒙，还是“敢于明智”的新时期启蒙，中国人的“启蒙情结”都跟 18 世纪的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就是康德。尤其是新时期启蒙，李泽厚、刘再复先后在哲学、美学领域重提康德并各自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之后影响波及整个中国思想界。我们也知道，在这两个为期均短的启蒙运动当中，美学与美育均是主角，都深入人心。作为 1949 年以后北京大学培养的高材生之一，孙绍振既沐浴了五四文化重镇诸多学术大师的思想余泽，又有幸得到当时云集北大的朱光潜、蔡仪、金岳霖、王力、高名凯、朱德熙、何其芳、王瑶等等各具代表性的哲学、美学、语言、文学大家的学术熏陶与逻辑训练，加上僵化的庸俗社会学的教条对他的伤害，更是孕育了他的怀疑与

批判精神——这样，在新时期思想启蒙运动当中，以《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为肇始，孙绍振以挑战的姿态、解构的精神以及“回到常识”的经验理性，向他一直深恶痛绝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空洞苍白的理论和一切违背常识与艺术规律的现象，进行坚决彻底的清算。与此同时，孙绍振率先进入了文学本体论的研究与批评，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著作《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等，对文学创作的客观规律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对美的结构进行重新思考，对艺术感觉的科学（情感的逻辑）进行系统梳理，他与同时代的一批重要的学者和批评家一道，为中国文论重建的科学性、系统性以及现实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除了一度兴起的国学热外，知识界在一个非政治性的空间里选择了西方后现代理论和后现代美学，然后在差不多十年时间里，把西方一个百年的文化理论与哲学思潮以及流派铺天盖地悉数译介了过来，营养过剩也罢，消化不良也罢，大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西方新概念的横移挪用，既无关于本土现实，亦谈不上有效的论证，又哪里谈得上能够真正切实地促进我们自身的知识增长？

当然关键还不在这里。我们熟悉、了解乃至做出选择，对于我们融入世界的学术视野与自身的文化理论建设，或者纳入所谓全球一体化，都是必需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的从此有了我们自身真切的知识积累，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个真正经得起检验的理论范式？如果缺失了这个起码的标准和要求，你又如何跟人家（西方）对话？问题倒不在于我们是否跟着人家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或者利奥塔、哈贝马斯或者巴赫金（也包括罗尔斯、布迪厄、阿伦特以及罗蒂等等不同学科的大人物）等屁股

后面转，即便是西方本土，出了一个理论界的大人物，也一样要风靡他们整个世界，群起效尤也屡见不鲜。问题在于，我们学习了西方之后会怎样？便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为重新解读孙绍振以及孙绍振的诸多理论文本和文学文本，殊关重要；重新认识孙绍振多年醉心论证的理论范式以及种种相关的知识边界，对我们自身知识的有效积累和我们种种理论范式的构建，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更何况，20年时间过去，如今我们特别清晰地意识到了孙绍振个人所做出独特的学术贡献的含金量，说白了，时间便是最好的检验官。

实际上，孙绍振的重要学术著作基本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美的结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论变异》，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与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所谓“观念年”、“方法论年”等未必有多少呼应，但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分明看到了孙绍振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家，几乎一开始便具有一种不寻常的气度和完全开放的精神状态。

特别是在不久之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文论引入内地，同时又有现象学文论以及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众多西方现代、后现代、后现代之后文论的涌入，孙绍振既不把它们当作洪水猛兽，也绝不盲目跟从，尽管我们一度所谓的理论“前沿”干脆就是以引介西方的各种文论为要务的，并以此为荣。特别可贵的是，在这个文论空前“繁荣”的过程当中，孙绍振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检测态度，不仅仅是检测西方现当代文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而且特别细心地检测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研究范式，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在自己已确立的学术旨趣与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孙绍振继续做出新的理论推导并往纵深发展，幽默学理论便是这个时期他醉心推出的研究新范式，而且同样获得了成功。

耐人寻味的是，孙绍振的文论创造跟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创造的时间大抵相同，二者各自面对的本土语境相去甚远，却也并非就没有可比性：首先二者一样是在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现代性话语覆盖中得以孵化与撒播，其次二者都产生于本土的思想运动与社会运动，比如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以及此前的萨特、加缪等人参与的种种社会革命实践及我国的“文化大革命”等，在不同的思想者那里都不能不打下鲜明的思想烙印和社会烙印。

福柯、利奥塔等先后在不同的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以及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接受了尼采、海德格尔以及弗洛伊德。而孙绍振跟所有有出息的理论家一样，对其当下的种种理论现实和社会实践，做出或深邃或沉稳或全面或迂回的种种回应。用孙绍振自己的话说就是：“严格地把政治的实用和认识的真以及审美区别开来，是朱（光潜）先生对我的最大冲击，也因此使得我与老师蔡仪先生的‘美是典型’，周扬所本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真），长期格格不入。”^①但他跟法国的一批结构主义者“通过张扬结构系统自身的自主、自足特性来代替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体现了当代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之后思想界的主体性消释趋势”^②，完全不同或者貌合神离。是的，孙绍振也非常重视结构系统自身的自主、自足特性，但他20多年始终坚持的恰恰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孙绍振坚定的批判立场与颠覆意识，跟结构主义者的批判是试图取消一直支配着从笛卡儿到萨特

① 孙绍振著：《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5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②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23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之哲学传统的主体概念（主体仅仅被视为语言、文化或无意识的产物而被摒弃，或彻底非中心化，他们强调符号系统、无意识、社会关系的首要性，强调主体性与意义的派生性），是处在完全不同的轨道上的。

准确地说，孙绍振赖以操持的批判和颠覆性的武器，仍然是启蒙理性话语，可以说跟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理论对理性主义和启蒙理论进行的一系列攻击所采取的立场完全相反。而且对于结构主义者的种种主张，是把语言看作思想的“载体”、“语言是物质的外壳”的孙绍振所不能接受的。也就是说，孙绍振面对的仍然是思维与存在的问题，而法国结构主义所面对的则是语言与存在的问题。二者面对的现实状况与思想状况完全不同，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看，法国结构主义都是作为存在主义推向极端的主观主义方法的对立物而出现的，而孙绍振跟我国新时期启蒙的一些思想精英一样，是以对一度甚嚣尘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的彻底批判者的面目而出现的。

这样是不是说，孙氏文论与法国结构主义在理论研究范式上存在高低之分？回答是否定的。实际上中西方所共同面对的均是现代性发生了种种问题，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现实与实践当中，存在的问题的性质、侧面、层次不同而已。孙绍振在《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一书的“自序”中，把自己的思想来源、理论方式以及所采用的具体方法等等，交代得格外清楚。他说：“康德在审美价值论中对于非功利性、非认识性、非逻辑性的论述，为我的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经典根据，我终于有信心把我长期酝酿的《审美价值结构及其升值和贬值运动》写了出来，对真善美统一的传统学说发出挑战，我没有像康德那样让真善美三者一般在一般层次上处于对立的地位，而是让它们处在互相错位的关系中，提出了三维‘错位’的观念。从此‘错位’就成了我日后整

个学术思想的核心范畴。”^① 一如法国当代思想家利科曾经评论结构主义乃是一种“没有先验的康德学说”一样，“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在孙绍振的学说中也一样没有丝毫的先验性。况且，孙绍振接受康德，有一半是出于朱光潜，另一半可能是出于我们“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文化传统。更多的时候，孙绍振所采用的知识立场是马克思、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包括黑格尔的正反合“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辩证法，而在他的体系当中也一样可以看到《矛盾论》、《实践论》诸多的活跃因素。这就是说，既然孙绍振接受的仍是马列文论的思想语境，那么他的理性选择自然就不像结构主义者，而走出了自己的路径。

由于长期以来深受机械论、独断论之害，尤其是深受公式化、概念化之苦，孙绍振对所有图解式的“假大空”深恶痛绝，对后来汹涌进入中国内地的所有文化理论，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因而对文学的特殊性研究、对感觉和情感的科学性研究，便成了孙绍振不懈努力并不惜为之贡献出全部精力的学术理想和目标。朱光潜对康德所做的评价是：“在西方美学经典著作中，没有哪一部比《判断力批判》显示出更多的矛盾，也没有哪一部比它更富于启发性。不理解康德，就不可能理解近代西方美学的发展。他的毛病在于处处看到对立，企图达到统一，却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只做到了调和与嵌合。”^② 显然当年受到朱光潜影响的人很多，我们记得新时期不少人热衷于“美的本质”的美学讨论，也便是从朱光潜指出的这一点纷纷转向对马克思的《1844年

^① 孙绍振著：《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自序》3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② 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下卷，40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一时间关于“异化”问题、“人的本质对象化”问题以及劳动、实践问题等文章不断发表，热闹也能够热闹，可惜仍然是停留在哲学层面上的居多，能够真切回答文学与艺术问题的理论，极为稀有。也便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绍振跟当年的诸多理论家拉开了距离。他说：“我选择的是创作理论，也许是可以叫做‘作家学’的那一种，而不是一般文艺理论。对一般的美学和文艺理论，我虽然也有所涉猎，但是却舍不得花太多的生命去钻研。我觉得，来自西方的那些抽象度很高的哲学、文化理论，不管它有多高的水平，总是学院派味道太浓，往往以脱离文学创作的实践为特点。”^①对朱光潜先生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他评论说：“朱光潜先生所谓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既不能统一于认识的真，又不能统一于道德的善，只能统一于美，由于认识价值和道德的实用价值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占有优势，所以只有通过艺术形式的审美规范，才能保证统一于美。这种统一中，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道德的实用理性的错位，和艺术的审美形式规范的定位是结合在一种张力结构中的。”^②这就不仅是从理论层面上，而且从实践的层面上，对朱光潜先生的上述命题进行了十分有效而又立体的全面推进。在具体推进和论证的过程当中，瑞士早期结构主义者心理学家皮亚杰的构造心理学，给孙绍振以重大启发，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等等，都被孙绍振所选择和改造，为之所用，且均在孙绍振的理论体系中成为某种细胞意义上的单

① 孙绍振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探险》，《自序》1页，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② 孙绍振著：《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5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位。这样一来，就让孙绍振的理论研究面目似乎有点驳杂，以至不少时候让人感到既有结构主义痕迹，又有实验心理学乃至创作心理学色彩，有康德体系的影子，有形式主义的因素，也有解构主义精神存在。

尤其是形式主义因素和解构主义精神，将是本书要着重展开讨论的两大主要内容。众所周知，孙绍振特别过硬的工夫，是体现在他的文本细读和解读上的。这种工夫，常常是国内众多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所欠缺的。而恰恰这种工夫，又是自美国“新批评”以来，直至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乃至当下的文化研究等等，所极力张扬并在诸多理论研究范式上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孙绍振的个人研究范式的有效性当然也不例外。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又恰恰是这文本细读，让孙绍振的文论跟解构主义文论形成了一种特别意味深长的精神交叉。

那么，也许我们就应该从这里开始，才可能比较真切地接近孙绍振文论创造的本来面目和精神内核。